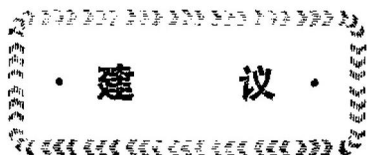


印之本,因此这两本书完全不具有“丛书子目索引”的作用,但可以担负起“丛书子目索引”所欠缺的一种功能,可以补“丛书子目索引”之不足;今日统计现有古籍之总数,即除了丛书所收数字之外,加上这两本目录书所收的单刻本一万五千种左右,古籍总数当在八、九万种左右。

正因为此书所收材料来源,都是孙殿起先生目睹手经,比较可靠;孙先生虽也十分留意于各书内容、版本优劣,但毕竟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,因而未能一一详加注明,我们只能在《琉璃厂小志》中偶而得见一二。这是有待于补充加工的方面。总的说来,它不失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古籍目录。



建议大力访求、收藏家谱(族谱)

金有景

我国图书馆、文化馆工作人员一般都知道地方志(县志、府志等)的重要性,许多图书馆和文化馆都知道收藏地方志。有的大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数量还很大,现在一般的县文化馆至少收藏有本县的县志。有一种书籍具有与地方志类似的性质和用处,各地图书馆和文化馆也应该访求它,收藏它,可是现在各地图书馆、文化馆工作人员好像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这种书籍是什么呢?是家谱。

解放以前,我国民间拥有的家谱,数量是相当大的。解放以后,在土改、四清等运动中已被毁掉不少,但是,总还留下一部分。一般地说,至少每一种家谱留下一份是不成问题的。可是经过文

化大革命，很多家谱都被烧光了。有的家谱经过一些人的细心保护，还能留下一部半部。对这些幸存下来的孤本、残本的家谱，如果再不及时抢救，也可能慢慢散失完了。眼看家谱马上要湮灭无存，各地图书馆、文化馆如果再无动于衷，坐视不救，我看多少年之后，后代子孙会埋怨咱们没有尽到责任的。

我相信各地图书馆、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会一般地承认家谱是有用的东西，可是它到底有多少用处，则不一定都很清楚。下面我来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。

家谱，大家都知道它与民族、历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有关。近年来，医务界利用家谱来作为食道癌流行病学研究的参考资料，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。这些，都先不去细说它。我作为一个语言研究者，专门来谈谈家谱在语言研究中的用处。

我认为，家谱对方言研究是很有用处的。这方面我要谈两点体会。

第一，家谱可以为研究方言的历史语音提供例证。

1980年二三月，我回老家——浙江义乌县下朱村调查方言时，无意中发现，下朱的金氏家谱（下朱村原来都姓金，土改后才搬进来几户外姓的住户），能为我们提供七八百年前下朱方言语音方面的一点线索。

下朱村的家谱在十年浩劫中已基本上被烧光。经过多方访求，才得悉全村还有人存留着一部。但因有关人员顾虑重重而未能见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请老人们写出下朱村金姓从始祖“千二公”起的全部辈份。老人们回忆说：据祖先传说，下朱村第一个太公（即祖先）是千二公，他出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年（1132）。千二公以下全部三十二个辈份是：

千万福祿，富贵荣昌，贤良方茂，汉楠为庄；起士开邦，聿给祖景，光明熠世，宏进隆盛。（其中前十六辈是开始时起的，后十六辈是以后续的。我本

人是“景”字辈，现在最新的一辈是“熠”字辈。约平均 32 年传一代，与一般的规律相符。”)

一般姓氏的辈份往往是押韵的。下朱村金姓的三十二个辈份，分四言八句，也是押韵的。现在先拿头十六辈来看看，它的两个韵脚“昌、庄”，从普通话和下朱方言的文读来看，都是押韵的；可是从下朱方言的白读来看，已经不押韵了：

	昌	庄
普通话	[tʂʰaŋ˥]	[tʂuan˥]
下朱文读	[tʂʰuan˥]	[tʂuan˥]
下朱白读	[tʂʰuaː˥]	[tʂʊ˥]

假定下朱村金姓的头十六个辈份是十二世纪上半叶制定的，那末“昌、庄”从押韵到不押韵，很可能是八百年来下朱村方言的一个变化。

再拿后十六个辈份来看，“景、盛”两个韵脚从普通话和下朱村方言文读、白读来看，都是押韵的：

	景	盛
普通话	[tʂiŋ˥]	[ʂəŋ˥]
下朱文读	[tʂiŋ˥]	[dzin˥]
下朱白读	[tʂiəːn˥]	[dzəːn˥]

假定后十六个辈份是十五六世纪制定的，那末，不难看出，下朱村方言在大约四百年之中，至少就“景、盛”这两个字的押韵方面来看，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。

以上点滴情况，我只是从金姓的三十二个辈份中看出来的。如果能看到下朱村金氏家谱，从中找到金氏祖先七八百年前留下来的某些诗文材料和其他材料，则必能窥探出更多的历史语音的线索。

现在我们研究中古汉语语音，文献方面依靠的主要是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一类韵书。如果全国说汉语的广大地区，每县都能找到一

定数量的家谱并切实加以利用,那么,不难想见,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,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第二,家谱可以帮助搞清一个地点居民的历史来源,从而有助于探讨一处方言的某些复杂问题。比如贵阳方言属于北方话中的西南官话,它的语音系统和北京话比较接近,北京人到贵阳听贵阳话完全能听懂。可是据贵阳的老人说,现在贵阳的老居民(即不算近几十年迁来贵阳的),他们的祖先基本上都是几百年前从江西、湖南等地迁来贵阳的。可是奇怪的是,现在的贵阳话里看不大出有多少江西、湖南方言的痕迹(特别是江西方言的痕迹)。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语言学问题,这个问题研究透了,对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是有好处的。可要研究透这个复杂的问题,首先要搞清楚:(1)现在贵阳的老居民(不计近几十年迁入贵阳的居民),他们的祖先是否基本上都是几百年前从江西、湖南等地迁来贵阳的?(2)如果是的,又是都从哪些县迁来贵阳的?都是什么年代迁来的?只有先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,才有可能进一步解决上述复杂问题,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,家谱无疑能起很大的作用。1981年初,我在贵阳访求过家谱。一方面可能确实毁得太多,已经所剩无几;一方面也可能我的接触面太窄,认识的人不多,结果象样的家谱一部也没有访到。我只访到一部所谓的家谱,它第一是手抄,第二只有不到一千字,只大致说明某姓是明朝时从江西省某县迁来贵阳的,至今已有多少代等等。如果能访到更多的比较正规、比较像样的家谱,那是会帮助我们解决一点问题的。

我从贵阳回到北京,脑子里总忘不了家谱,有时做梦也想到家谱。作为一个语言研究工作者和方言研究工作者,我要向各地图书馆、文化馆的领导同志和一般工作同志大声疾呼:为了祖国的文化事业,请求你们大力抢救尚存的家谱,不使它们进一步散失和湮灭。我曾幻想,在中央和各省的大图书馆里,多少年后纷纷开辟家

谱阅览室,那里陈列着大量的各地家谱,任人(也包括作为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我)自由借阅,……这该是多好啊!

1981年7月6日于首都

张之洞致袁世凯电稿二件

(一九〇二年)

(一)

急。保定袁宫保: 岷师骑箕,实堪痛惜。前年支持危局,实赖岷师与公大力维持,鄙人得以追随其后。三人同心,故能有济。内忧外患,同志日稀,更不仅老成雕谢之感。想公亦有同心也。目前急事是商约,要事则不止数十百端,鄙人忧灼非常。美、日约坚不加税,而日索过奢,美亦不爽快。尊意有何良策? 祈速示。以后唯有事事商请教益,仰赖良谋神力,开启茅塞,庇荫东南,感甚幸甚。回籍行期在即,惟盼大事毕后,早咏公归。 洞漾 壬九月廿四日子刻发。

(二)

顺德府电局专差飞送袁宫保: 商约重要,盛杏翁又丁艰,断非鄙人所能胜任。故奏请公与伍使同议商约。幸蒙俞允,天从人愿,欣幸万分。此事非公不能主持,鄙人当奉令承教而已。宥电读悉,已会尊銜电奏。请催伍使回华,稿另电达。 洞艳亥 壬十月初一日子刻发。

(苏州博物馆供稿)

注

张之洞电稿原件十五则,现藏苏州博物馆。此二件未见《张文襄公全集》,现在发表,以供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参考。